

殷周秦汉国家治理 思想及其工具性价值研究

YINZHOUQINHAN GUOJIA ZHILI
SIXIANG JIQI GONGJUXING JIAZHI YANJIU

胥仕元◎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殷周秦汉国家治理 思想及其工具性价值研究

YINZHOUQINHAN GUOJIA ZHILI
SIXIANG JIQI GONGJUXING JIAZHI YANJIU

胥仕元◎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卓 墨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周秦汉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工具性价值研究/胥仕元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01-015370-4

I. ①殷… II. ①胥… III. ①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商周时代②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IV. ①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2118 号

殷周秦汉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工具性价值研究

YINZHOUQINHAN GUOJIA ZHILI SIXIANG JIQI GONGJUXING JIAZHI YANJIU

胥仕元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06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5370-4 定价:2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国家治理问题是一个国家发展和进步的重要问题,治理首先要有完整系统的国家治理思想,治理是行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因此,国家治理思想是制定治国方略的依据,对其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属于政治范畴,国家治理思想属于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的范畴,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为后人研究和借鉴提供了充实的前提。笔者大学期间就对殷周秦汉时期政治家、思想家的治国思想颇感兴趣,对先秦诸子和秦汉时期思想家的原著初有涉猎,慢慢认识和领会他们思想的内涵。工作以后,在高校从事教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因此,《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老子》、《庄子》、《墨子》、《商君书》、《春秋繁露》等等就成为笔者必用之书,每读一次,都有新的收获。诸多先贤深邃的思想吸引着笔者去学习,更促使笔者去思考,思考思想形成的环境,思考思想家探讨问题的方法,更多的是思考治国思想的价值,思考之余,不经意间有了将这些思考结果写出来的念头,随后就开始了梳理、阐释、分析、解读、形成文字的工作,这个过程是艰辛而漫长的。尽管勤恳,但由于笔者的学力所限,本书的研究探讨,只能是一种尝试,

笔者写作的初衷不是像学界大师那样以时间顺序详细撰写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产生的缘由和发展的系统过程,而是就殷周秦汉时期国家治理思想中重要的若干观点的内涵加以阐释并对其工具性价值进行探讨,问题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可以以点带面窥殷周秦汉国家治理思想之全貌,这样做是否可以称为另辟蹊径,尚待学界同仁的评判与指正。

一、概念的界定与题解

对所研究的问题,首先进行基本概念的定义是非常必要的,那么,笔者就对本书的几个基本概念做一界定,以告诉读者,笔者要说什么、怎么说。

对殷周秦汉国家治理思想进行研究,必须说明的有三点,即殷周秦汉的时间、国家治理思想的内涵及工具性价值指的是什么。

就时间上而言,殷周秦汉上限起自殷商,下限到东汉结束。

国家治理思想,就是历朝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国家的理论、观点和学说。笔者认为,治理必须有的放矢,先认识国家是什么,^①国家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才谈得上国家治理,不然探讨治理就非常突兀,就似空中楼阁。如果我们不是具象地看待治理,那么,国家是什么,国家是如何组织的,本身就是治理的一部分。本书不是面面俱到地将每朝每代那些治国思想代表人物全部和盘托出,展示他们的思想,如果那样就写成了治国思想史。本书是要归纳提

^① 我国古代思想家对“国家是什么”这一问题探讨的不是很多,但思想家们认为国家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种观点、一种态度。

炼几种在殷周秦汉时期产生的,在中国社会中影响巨大、影响深远的思想观点进行探讨。通观殷周秦汉时期国家治理思想的整体脉络,我们会发现有些思想有相当的连贯和接续性,如“王权至上”到“君主专制”,“无为而治”到“黄老思想”,“敬天保民”到“民本思想”,有些甚至是为执政者所用后殊途同归的,如“别黑白而定一尊”和“独尊儒术”等。这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的发展,凝聚了众多思想界大家和政界人士的探索和思考,使这一时期国家治理思想熠熠生辉,也为中国两千年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延续提供了智力支持。本书将选择若干具有接续性的重要思想观点为逻辑的路径,并集中探讨它们的工具性价值。

国家治理思想是高度凝练的理论体系。一方面,上升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国家治理思想,理论性不言而喻,统治者会大力宣扬并使其系统化、理论化。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关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有的也许不会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它是对理想社会模式的设计,具有相当的理论性。有的能够开启民智,启发人们思考,其必然应该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另外,理论形成之后有其延续性,所以,本书对某些国家治理思想的探讨,可能会简略追述其理论渊源、产生的影响,也许会使读者觉得有冗长之感,但笔者在此说明,不会用大量篇幅追述某一种思想的前世今生,凡简单回顾的都是与本书某一观点紧密相关的。

国家治理思想的工具性价值是本书研究的重点。用工具论的方法进行研究,也有人称其为工具主义,就工具主义而言,杜威曾说过这样几句话,他认为“工具主义是通过主要考虑思想如何在将来后果的实验决定中起作用,来构成关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各种

形式的准确的逻辑理论的一种企图。”^①这样的表述需要我们闭目沉思、细细玩味,进行纯哲学的思考。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而言,国家治理思想就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就是一种工具,就是如何把概念、判断、推理等理论运用于实践,从而指导实践,也就是国家治理思想由理论性到实际的转化过程。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国家治理思想的工具性价值突出表现为三方面,一是执政者将治国思想转化为政治实践,指导现实政治活动。二是思想对思想的影响,即前人原创的国家治理思想对后人思想形成的借鉴作用,“诸子学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其思想的原创性”^②,本书所涉及“轴心时代”^③以及秦汉时期思想家的国家治理思想无疑为后世思想家思想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高起点,就是这种借鉴的体现。三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治理思想对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走向、民众生活等各方面的引领和影响。另外,需要说明,治国思想的工具性价值在现实中的表现,呈现的结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笔者在书中的分析只是为读者提供一个视角,不是一种裁断。

二、探讨国家治理思想及工具性价值的意义

首先,国家治理思想对民生有重大影响

任何具有系统理论性和工具性价值的国家治理思想,可能都

① 刘延勃、张弓长、马乾乐、张念丰主编:《哲学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工具主义”词条。

② 李振纲:《中国古代哲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③ “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古希腊、中国、印度、以色列等地出现了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对人类面对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为不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人类进步的重要的精神财富。

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上升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国家治理思想其影响具有全局性,或专制、或民主,其结果都需要全社会承受,归根到底,承受的主体是天下百姓。古代统治者治国思想重民爱民,以仁德之心治理天下,善待百姓,百姓就生活在所谓的“太平盛世”,能够安心生产和生计。统治者治国思想落到实处体现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百姓必然生活在争战不休、徭役无度的暴虐之世,流离失所,生活困顿。间或稳定间或动荡不安的所谓“治世”或“乱世”,都与统治者的国家治理思想息息相关,可见治国思想的重要性。之所以把国家治理思想与民生的关系放在研究意义的首位,是因为笔者认为,人类任何方面的奋斗、进步,都是为了改善人的生存环境、生活环境,都是为了生活的更好,国家治理思想也不例外,执政者希望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关注民生。因此,研究国家治理思想,必须明确其与民生的关系,才有探讨其他方面的必要。民生问题也是百年前孙中山先生的主要主张,同时,也是我们当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国家,构建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其次,政治、治国问题与每个人相关

生活的需要,使人们的思想逐渐发达,进而思考政治,如果对国家问题有所思考那就是治国思想。

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人们的头脑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能够生存下来的首先是那些产生了想象力的人群,正因为他们的想象力,他们可以把种子埋在地下,使其生根、发芽、结果,供人类食用;正是他们的想象力,促使他们懵懵懂懂地把水装在天然的容器中以备不时之需;也正因为想象力,使他们可以把动物圈养起来提供不竭的肉食等,这些作为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

活状况。这种想象力就是最早的思想,思想的发达是人类远离动物的主要标志,戴尔·卡耐基说:“如果现在我了解你的思想,我便了解你这个人。思想造就一个人。”^①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思想,那就和动物没什么区别。国家治理思想是国家产生后才有的,是人类思想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总体思想的升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们过政治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远古时代,一旦某一天哪个人觉得大家在一起生活更有质量、更安全,他就是在思考政治问题了。“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②那么,人类必然要过政治生活。因此,在社会状态下,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就已经成为与政治无法分离的个体。道教思想家葛洪曾说“在朝者陈力以秉庶事,山林者修德以利贪浊,殊途同归,俱人臣也。”^③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论在朝还是在野,不论从事什么活动,其实都和现实政治有关。顺此推理,一个人做官,做个“清官”、“好官”,就有利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有利于他治政的那片土地和人民。一个人经商,守法自律,公平交易,就是在维护行业秩序,就是在维护社会的有序。一个人隐居山林,就减少了社会上可能走向贪腐或引发社会动荡的个体的数量,客观上为净化社会空气做出了贡献。各行各业皆如此。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所说:“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

① [美]戴尔·卡耐基:《人性的弱点》,林杰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

③ [晋]葛洪:《抱朴子外篇·逸民卷第二》。

治体系之外。一位公民,在一个国家、市镇、学校、教会、商行、工会、俱乐部、政党、公民社团以及许多其他组织的治理部门中,处处都会碰到政治。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①我们今天研究治国思想,其实也是在做有益于政治的活动。我们的希望是,潜心思索进行研究的活动要成为政治的正能量,研究的问题能够为现代政治服务,能够为现代政治哲学的研究增添一缕有益的话语,拓展政治哲学研究的视野。

再次,国家治理思想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国家治理思想与制度的关系其实就是理论与工具的关系,张分田先生认为“思想”和“制度”在实际历史过程中,“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往往交织在一起,互为先导,互为依据。在政治领域中,没有没有‘思想’的‘制度’,也没有没有‘制度’的‘思想’。换句话说,‘思想’是‘制度’的灵魂,‘制度’是‘思想’的物化。”^②很明显,这一观点说明的是思想与制度的作用与反作用,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分析非常透彻,借用张分田先生的基本观点,来探讨本书的主旨,可以说思想的理论性可以作用于制度的工具性,制度的工具性在实践中的不断探索又丰富了治国思想的理论性。从古到今,每一次治国思想的转变都会促使制度的整体或部分变革。古代商鞅的法治思想,促成了秦国改革旧制而实行法治,凡事“一断于法”。近代的“西学东渐”为沉寂的古老中国吹来一股清新之风,但这股风吹散了“中体西用”的美

① [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② 张分田:《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好设想,掀起了思想界的大解放热潮,加速了封建体制的坍塌。因此,我们现在研究国家治理思想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和制度构建及完善息息相关,意义重大。^①

第四,国家治理思想的重要性还表现在思想的时空穿越性

国家治理思想能够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两类人,一是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如帝王将相;二是关注国计民生的思想家和民间人士。

历史上诸多的帝王将相,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对国家如何治理的思考运用于当世,波及后世,在历史的长河中记下了一笔,思想的影响力穿越了时空。历史上众多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这些非终身享受荣华富贵的人物,却因他们理论的深邃而流芳后世,毋庸讳言,他们思想中的核心内容都集中在如何治理国家层面。再如,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人类之所以能够今人胜于古人,就因为思想文化的不断传承、进步,仅就这一点,可以说,帝王将相国家治理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值得肯定,那些一辈子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思想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国家治理的探索同样值得尊重,因为他们的思想都穿越了时空,使后人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新的高度思考问题。“1988年1月,全世界当代诺贝尔奖

^① 有学者认为,在繁杂的政治思想中,有一些是带根本性的。由带根本性的思想指导、引申出许多思想来。我们把这些极少数的带根本性的、最基本的思想叫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引申出各种政治思想,依据政治思想制订政治制度,按照政治制度进行政治活动,采取政治措施。(参见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笔者认为,治国思想与政治哲学是相互交织的,政治哲学具有先导作用,对认识研究国家治理思想对制度建设的意义有重要作用。

获得者云集巴黎举行会议，会上发表的宣言的第一句话便是：“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 2500 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①仅此一例，说明作为“素王”的孔子的思想，影响越来越大。他的思想不仅在汉唐时期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及东南亚各国，也不仅仅是十八世纪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触媒，^②更体现于当今孔子学院的建立。从 2004 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建立第一家孔子学院开始到现在，孔子学院已经在一百多个国家或地区落户，使孔子成为了世界的孔子。这种穿越两千年，遍及各大洲的时空影响力是无人企及的。诚然，其他为后世留下宝贵国家治理思想遗产的思想大家，也将由于他们思想的深邃及时空穿透力为后世铭记。

第五，殷周秦汉时期国家治理思想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具有奠基意义

在中华民族的“轴心时代”，涌现出了以周公、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商鞅、申子、慎子、墨子等为代表的一大批

① 转引自王齐洲：《文圣孔子》，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 页。

② 法国启蒙泰斗伏尔泰推崇中国儒家学说，对孔子更是尊崇有加，他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他把孔子的学说与基督教相对比，认为基督教是虚伪的、迷信的，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则是人类的幸福与和平的再现，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耶稣禁止人们行恶，而孔子则规劝人们行善。如果硬要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称为“儒教”的话，那他只能是一种道德化的理性宗教。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是《圣经》以前的文化，在基督教所说的世界洪水之前，中国早已开始了自己的历史。中国历史悠久，最可信，最有价值。伏尔泰强调中国历史悠久，其用意不言自明，以此否定基督教极力宣扬的上帝创世说。（参见刘绍学：《理性之剑——重读伏尔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8—170 页）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这种观点的确立，使中国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对启蒙运动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思想先哲,^①他们有关国家治理思想的思考和总结既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奠基之作,也是后人思考国家治理问题的起步之阶。

秦汉时期涌现出了李斯、陆贾、叔孙通、贾谊、董仲舒等一大批兼思想家与政治活动家为一身的时代精英,他们的国家治理思想或旗帜鲜明,直抒胸臆;或隐晦含蓄,隐忍指途。对后世思想家或执政者思想或治国方略的形成功不可没。这一时期,国家治理思想对实践的重要成果是通过两位帝王来实现的,他们是奠定中国古代根本政治制度框架的秦始皇和确立儒术独尊的汉武帝。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和汉武帝独尊儒术,是两个影响极其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前者集先秦政治文化之大成,确立了此后两千年的基本政治制度;后者把儒家推上了统治思想的地位,为此后两千年的主流文化和学术发展确定了基调和方向。这两件大事标志着皇帝制度及其法定意识形态的确立。”^②汉以后直到封建社会完结的治国思想,少有突破,基本上是对殷周秦汉时期国家治理思想基本观点的再解读。

① 冯天瑜先生认为先秦时期的一些典籍是中华民族最富于“元精神”的典籍,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以及《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孙子》等,“中华元典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人们要想透视中国人的灵魂,需借助对这几部书提供的符号编码的破译,正如透过《吠陀》去了解印度人,透过《荷马史诗》、《理想国》、《形而上学》去了解希腊人,透过《圣经》去了解基督徒,透过《古兰经》去了解穆斯林一样。”(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献辞第1—2页。)笔者认为,先秦时期的这些典籍,毫无例外地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元典,本书中所探讨的基本观点大多数出自这些元典或在元典基础上形成,由此展示这个时期思想家及其思想的重要价值。

② 张分田:《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殷周秦汉时期,“君主集权或专制”由有君主开始一以贯之;“民本思想”由周公敬天保民开始一以贯之;“独尊儒术”由“经学”上升为统治学术一以贯之。期间,加之有短时间的“黄老思想”无为而治和“谶纬之学”的填补和伴随。所以本书的探讨尽管有时间的界定,但思想的工具性价值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这几种思想观点为历代的执政者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治国理政经验和素材。

第六,客观地看待思想成为统治阶级治国思想对学术本身的影响

就整个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而言,不同的学者在总结时会划分为不同的主线。如有人认为汉武帝以后至帝制结束都是儒家独尊;有的认为宋代理学产生后才真正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有的认为学术上升为治国指导思想本身不是一家一派的垄断行为,而是各家学说交融互补的结果,比如儒释道三教的交融与互补。诸如此类的论断,自有其道理,在治国思想对学术的影响方面,不少学者对某种思想成为治国指导思想有益于学术本身持肯定态度。笔者认为,一种思想成为统治者所需的治国思想,对其自身发展是利是弊,需要具体分析,一方面,上升为治国思想,主张和维护该种思想的团体会得到执政者的支持,该团体的成员会进入统治集团,可以利用更多的资源,如公共资源、行政资源等为其学术的精进提供保障,也可以利用政权的力量压抑其他学说的传播。另一方面,成为为执政者所需的用来维护统治的思想,纯学术研究的路径可能要发生改变,这就涉及“学”和“术”的关系,在正常情况下,“学”有自身的发展路径,但有时也需要迎合“术”,因为“术”可以直接为执政者所用,换句话说,统治者本身需要的就是术。有的思想观点,“学”的总结是直接为能成为“术”而提出的。如果仅仅

从实用的角度看,不是合理的“学”就能为执政者所用,而是能够转化为“术”的“学”才能运用于实践。董仲舒因为论说灾异差点丢掉性命,被汉武帝免官居家,但“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①为什么汉武帝要派人去问董仲舒呢?答案只能是,为了推行“术”需要学的阐释。正如有学者认为:“张汤等前来绝不是要董仲舒对朝廷的政策发表什么意见,而是到他这里来索取经典的阐释。”^②此时,“学”的工具性价值就会自然表现出来,也就是学要用来论证官方治国方略的正确性,出现的结果可能是,如果官方正确,那么,学起到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如果官方不正确或者谬误,那么,“学”就是助纣为虐。学术本身成为服膺于统治者的轿夫。学术的味道渐稀,政治工具性的味道渐浓,对学术本身负面影响是极大的。

从另一方面而言,中国古代不止一位具有“唯物主义”意识的思想家,他们的治国思想不可谓不合理、不可谓不正确,但他们的“学”不一定是符合执政者的“术”的学,故能为执政者所用的寥寥无几,而那些并非正确、合理,但能成为“术”的思想却能登上大雅之堂,岂不是很值得深思嘛!

第七,使国家治理思想成为通识性知识

作为从事政治学、政治哲学学习和研究的一分子,有责任将政治哲学理论、国家治理思想从高校的课堂上和既定的书本里解放出来,让它成为群众了解的通识性知识,让国家治理思想走近大众,让大众了解国家治理思想,国家治理思想并不为某些人所专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吴涛:《“术”、“学”纷争背景下的西汉〈春秋〉学——以〈谷梁传〉与〈公羊传〉的升降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学,使群众增强对国家治理参与的热情。引用马基雅维里的几句话也许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一问题,“我想,一个身居卑位的人,敢于探讨和指点君主的政务,不应当被看做僭妄,因为正如那些绘风景画的人们,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性质便厕身于平原,而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顶一样,同理,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君主,而深深地认识君主的性质的人应属于人民。”^①当今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如果能够让他们了解古代执政者或思想家的治国理念,那么,他们就会增长古人治国理政的知识,作为借鉴,就能够更清醒地对当今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透彻的认识和分析,减少盲目性,增强理性,积极主动地参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

周桂钿先生认为,一本书称得上精品,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精炼,第二很通俗,第三要非常深刻。^②周先生的归纳可谓雅俗共赏,把“通俗”列为精品的条件也给知识分子做学问以有益的启示。有此认识,本书内容的表述将兼学术化的语言和通俗化的语言为一体,不失学术的本真,又能够接地气。

客观地讲,目前国民参与国家治理的热情有待提高,也有很大程度的被动性,究其原因,国民缺乏治国思想的储备有极大关系,有人看到社会政治生活当中一些表象的东西,希望改变,但具体如何做又显得很茫然,甚至有人认为政治离自己很远,不是自己关心的事情。我们对古代国家治理思想进行研究,就是着眼于把国家

①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页。

② 参见周桂钿:《孔子与〈论语〉》,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组编:《诸子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治理思想转化为大众能够理解、能够借鉴的精神食粮，为国家政治的健康发展，为大众真正成为影响国家治理的力量做出尝试。

第八，批判地借鉴古人的治国思想服务于当今政治

研究该问题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总结以往，借鉴过去服务于当今。殷周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它囊括了古人国家治理思想的重要成果，对确立权威、制度构建、施政方略、处理君民关系、选拔人才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这些毕竟是那个时期先贤们的所思所想，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精华需要吸收，但糟粕必须批判。在新的历史时期，理论工作者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斋中啃食前人的东西，更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引领新时代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国家的理论思考，为当今的政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因此，任务艰巨而繁重，只有不懈的努力，认真探索和凝练，了解国家政治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才不愧对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三、几点说明

第一，对古代学者参政的再思考

秦汉前的许多思想家当然都是学者，孔子构建了“天下有道”理想社会的蓝图，孟子绘制了“仁政”治国方案，荀子的“王制社会”详细而具体，老子的小国寡民、庄子的至德之世自然而恬静，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野时是学者，执政时是官员，他们绘制的是法治国家的蓝图。上述无论那一幅画卷都能够启发人们思考，这些先贤中个别人做过官但好景不长，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大部分没有做过官。更有战国时齐国的稷下学宫招罗天下贤达“不治而议论”，为什么齐王给这些人提供了那么好的生活、研究环境，而只是让他